

沉默的世代 行動的年代

文 / 邱文彥

十餘位重量級學術菁英最近在一場「面對公與義」的座談中，感嘆「知識分子不見了」；知識分子是社會改造的原動力，他們的感嘆與焦慮，自然引發廣泛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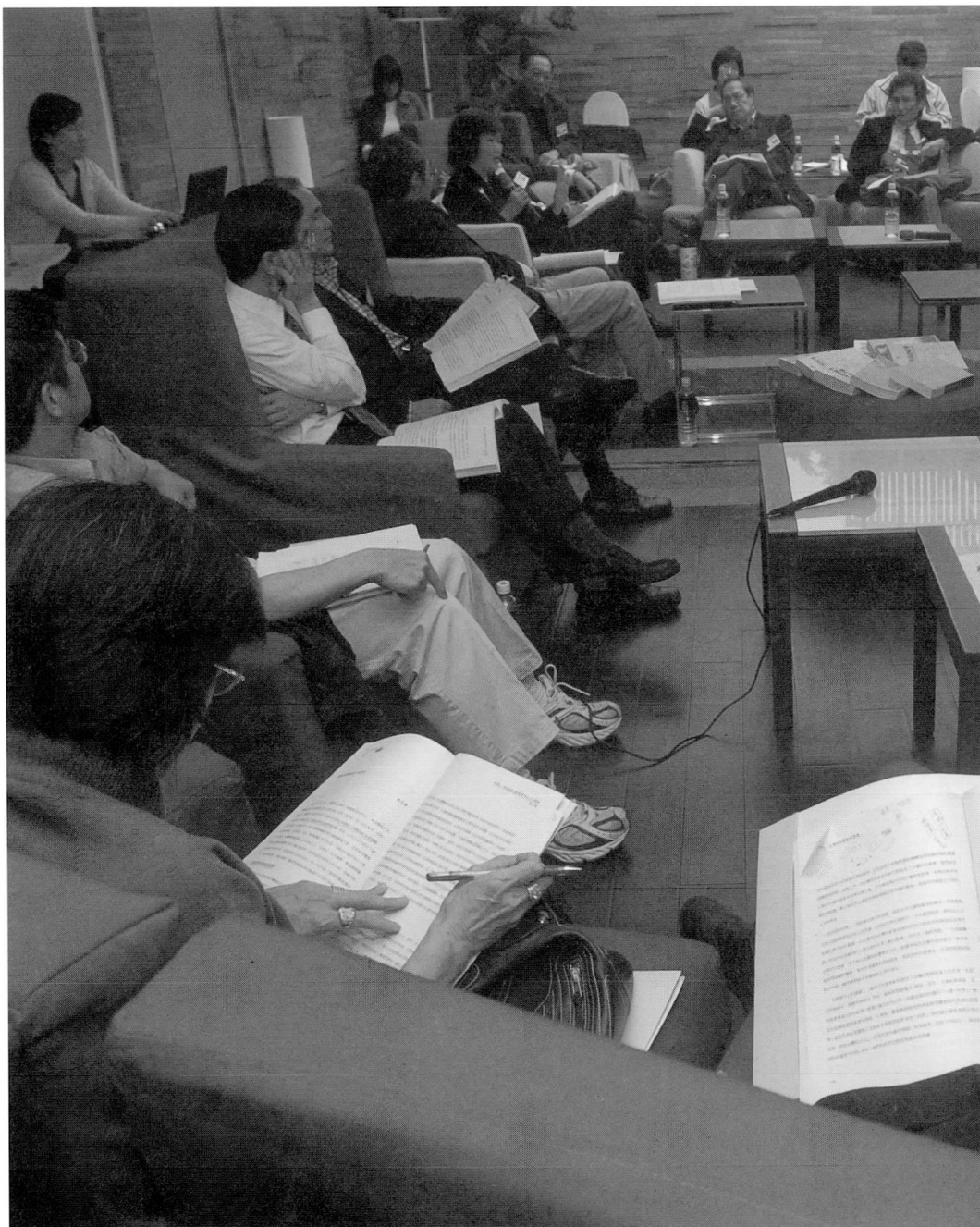
政治劇烈變化讓人也扭曲

相對於八年前，很多人的確感到知識分子的熱情消散，茫然、鬱卒，甚至冷漠。當年與政治人物結合打下了天下的人，有人意氣風發當官去，依舊侃侃而談，不過內容不知該說是「務實」，還是更為「虛幻」。沒當官的人突然失去奮鬥標的而逐漸沈寂，即便看不慣老戰友台上作為，在自己都難以自圓其說的情況下，也不願說出真話。

少數還堅持的死硬派，為了公與義還努力衝鋒陷陣，幾年過後也等不到預期結果，一一失望灰心。台灣上層的知識論壇，的確安靜許多，原因很複雜，有心理的、有外在的。但不容否認，幾年來政治劇烈的變化，人都扭曲了。

為什麼知識分子不願跳出象牙塔？多半服務於大學的知識分子，目前的境況很尷尬，學校的制度牢牢套緊他們，讓他們難以有餘裕精力融入社會，「可能」是一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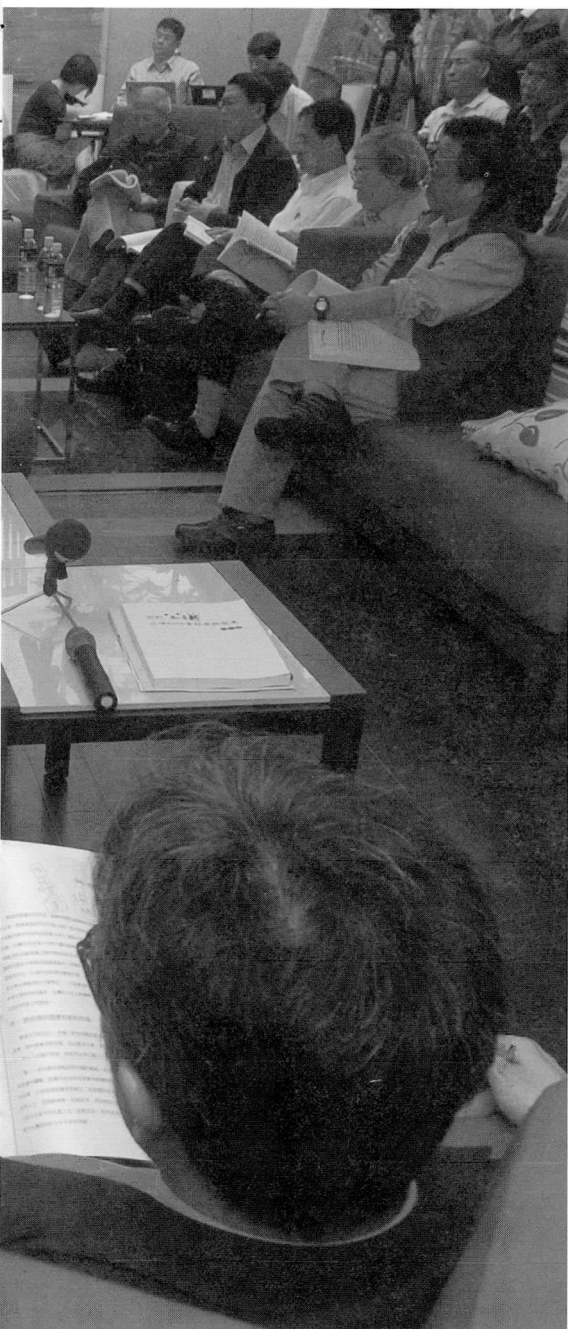
舉例來說，《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也就是說，研究、教學和服務社會是教師們的天職；但是誰都知道，今天大學教



◆在盍各言爾志的互動氣氛中，午后陽光早已轉為昏黃夜色，與會者仍然試圖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尋找出路。

師的升等、續聘的評鑑辦法過度側重於「研究」部分，又研究成果的評量，沒有SCI、SSCI等國際期刊論文幾乎只能

原地踏步，本國文字的專書或論述被認為等而下之，參與公民社會的活動被認為「不學無術」。



學校制度僵化猶如緊箍咒

教師的評量如果都只有這套辦法，教師非但沒有尊嚴，缺乏充分思考的自

由，失去批判和反省的動力，教師也可能漠視教學、壓榨學生，為了多弄幾篇論文充數，學校也將逐漸失去特色和自我定位的自信。

一個國家連自己的文字都不認同，能提升什麼文化？知識分子噤聲不語、不願關心熱衷於公眾事務，如何促進國家發展？充其量不過獨善其身而已！長此以往，這些教師評鑑的方式，勢將與「新科舉制度」無異，豈非綁死年輕教師活力，以奴役知識分子而已？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中堅，他們如果不願意或沒辦法發揮作用，這個國家和社會就很可悲了。雖然知識分子不語，他們是否真的消失了？成功大學陳美霞教授在「當我們面向草根社會」一文中，以SARS衝擊後醫療界形成的群聚，見證仍然有一批可貴的知識分子堅持、活躍著實踐他們的理想。

筆者也瞭解，台南社區大學黃煥彰教授為了台南地區台鹼和二仁溪的戴奧辛與重金屬污染問題，遭人恐嚇傷害，依然鏗而不捨。我們相信，還是有無數的朋友秉著知識分子良心與專業，在這社會不同角落，發揮相當影響力。

知識分子不語不代表消失

筆者長年參與海岸管理的研究，曾經協助內政部營建署研擬過「海埔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海岸法施行細則」和甫經行政院通過「永續發展整體發展方案」...等相關海岸管理研究，這些學

術研究形成的法案，相信對於保護台灣自然海岸應有一定成效。筆者過去擔任「濕地保護聯盟」理事長時，與濕盟志工和高雄市政府密切合作，開啟「洲仔濕地」的水雉復育計畫，並提出「西高雄濕地廊道」的構想。

參與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時，在其行動計畫中納入「完成重要濕地與珊瑚礁區域分佈圖」工作，此後協助營建署評選會勘，去年底我們終於完成全國七十五處濕地的畫設，逐步落實台灣濕地保育網絡的建構。筆者也曾為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研擬修訂「二〇〇六海洋政策白皮書」，為教育部主辦「海洋教育高峰會議」，同時協助編輯「海洋教育白皮書」。

在台北縣永和市的社區運動中，我們一群知識分子與社區民眾經過漫長五、六年時間，改造了「台北愛河」新社區，也讓原本高達二十七公尺的快速道路，成功地成為平面園林藝術大道。

雖然政治紛紛擾擾，台灣還是有一些機會，讓知識分子藉由決策參與、議題倡導、公民運動、社區大學、民間社團去發揮理想和所長。如果僅是清談，失去熱忱，沒了動力，台灣的社會還有什麼希望？知識分子該開口和行動了！

（作者為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